

智治之维

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研究

张欣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智治之维

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研究

张欣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智治之维：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研究/张欣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3
ISBN 978 - 7 - 5203 - 0854 - 0

I. ①智… II. ①张… III. ①咨询机构—作用—公共管理—研究 IV. ①C932. 8②D0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398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晓红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 25
插 页	2
字 数	256 千字
定 价	79.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15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管理学重点学科建设

[项目编号：黔财教（2015）134号]

摘 要

知识经济时代和复杂性时代的到来，使以知识、信息和创新思想为主体的新发展动能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指向。当知识取代物质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载体和来源，当日益复杂化的公共治理问题使原有治理形式和方法面临功能失调，以新思维重构社会发展新动能，以新方法应对复杂化的新问题便成为时代对公共治理的新要求。公共治理的新要求在我国体现得尤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的公共治理不仅要面临知识经济时代和复杂性时代所带来的全球性时代课题，更要面对在新发展阶段的中国课题。如何有效回应时代对知识、信息和思想的要求，如何以新思维、新方法和新资源应对我国公共治理的新问题和新情况，以“智”为中轴的治理模式逐渐成为公共治理的发展趋势和要求。本书提出“智治”概念作为公共治理的新理念，强调以“智治”的视角重新审视公共治理，进而对公共治理的主体、理念和方法进行再思考。本书在提出“以智咨治，以智启治、以智辅治、以智治治”公共治理新思维的基础上，强调通过“智治”模式实现公共治理由传统工具化治理向当代价值化治理的有效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与公共治理的多中心、网络化和合作化的内在本质相契合，更是对公共治理新资源、新方法和新能力的积极探索。

智治的本质——智慧与治理的关系要求以知识、信息和创新思想实现对公共治理的有效支持，从而构建“智”与“治”的良性互动与协同发展下的创新治理、知识治理、动态治理和智慧治理。然而，作为智治前提的“智”（知识、信息、方法、技术和创新思想等）从何而来便成为有效实施智治之前必须思考的问题。作为社会发展的瞭

望者和观察者，作为专业领域的探索者和权威者，作为思想之库、知识之库和智慧之库，作为公共治理的重要思想源，智库在公共治理的智治实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智力支持作用，这使得对于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实现和扩展成为有效实现智治的关键。本书通过对智库在公共治理中“聚散效应”的分析，系统阐述了智库在公共治理中问题域、方法域和资源域中“聚焦问题、聚集资源、聚汇方法”的内聚效应以及“空心Y域”（治理力扩散）、“Y域”（治理力形成增长极带来的扩散）和“治理场域及其能量”（经验化治理向知识化治理、工具化治理向价值化治理以及他治向共治和自治的转变）的三阶扩散效应，从而对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及其运行机理进行了定位和系统分析。

在明确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及其运行机理的基础上，本书从制度、结构、能力和需求等多元化角度系统分析了当前我国智库在公共治理中有效实现和扩展功能的内外困境及其成因。对于如何有效解决当前我国智库面临的困境，从而实现智库功能的发挥和能量的释放，本书采取比较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西方各国智库发展的审视和经验教训的借鉴，为我国智库当前困境的解决和有效发展提供新思维。西方智库的发展和繁荣是外部拉力和内部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给予我国智库建设发展和功能实现最核心的启示在于：强调智库建设和发展的系统化，智库功能实现和扩展的综合化以及以“智”与“治”有效互动为内核的智库与公共治理发展的协同化。在充分借鉴西方智库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本书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加强智库制度化建设，促进智库多元化发展，推进智库市场化运行以及完善智库社会化服务的智库功能实现路径。试图通过对我国智库外部环境的塑造、内部能力的提升和服务面向的扩展，充分保障我国智库功能的实现与扩展，进而实现智库与公共治理的协同发展，最终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关键词：智治 智库 公共治理 聚散效应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1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文献述评	7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9
第四节 创新点和难点	22
第二章 智治与智库的内涵和关系	26
第一节 公共治理的当代形态：智治	26
第二节 知识与思想的承载者：智库	50
第三节 智库与智治的关系：内在契合与耦合共进	70
第三章 智库在公共治理中功能的运行机理	81
第一节 公共治理中的三个场域	81
第二节 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内聚”功能效应	84
第三节 公共治理的“空心 Y 域”	120
第四节 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扩散”功能效应	123
第四章 智库在公共治理中功能实现的现实困境	137
第一节 制度平台缺失对“聚散效应”的阻碍	138
第二节 结构体系失衡对“聚散效应”的分离	146
第三节 内在效能不足对“聚散效应”的抑制	160
第四节 社会需求缺乏对“聚散效应”的消解	171

第五章 西方智库治理功能实现的经验和启示	180
第一节 西方智库“聚散效应”实现的外部拉力	180
第二节 西方智库“聚散效应”实现的内部驱动力	195
第三节 西方智库在公共治理中功能实现的启示	205
第六章 智库在公共治理中功能实现路径的构建	211
第一节 以特色化路径引领智库功能发展方向	211
第二节 以系统化制度保障智库功能稳定运行	215
第三节 以多元化结构推进智库功能均衡发展	224
第四节 以市场化机制增进智库功能内在效能	233
第五节 以社会化服务扩展智库功能辐射范围	244
第七章 结论	252
参考文献	256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一 选题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不仅体现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追求，也指明了深化改革的有效途径。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既有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如先进的理论指导、正确的发展道路、鲜明的创新导向、强大的制度依托；也有面临的难题，如人口众多、区域不平衡、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凸显、物质基础较为薄弱、社会组织弱小等。如何充分发挥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优势，有效应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和挑战，便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当前，我国进入了社会发展的高危和高风险期，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公共治理的复杂性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性前所未有，我国在国力快速提升的同时，经济结构多元化、社会阶层多样化和利益诉求复杂化带来了现代治理难题。在复杂环境中如何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如何建立、完善科学有效的制度，如何有效整合社会多元力量和资源，如何创新地、灵活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成为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纵观西方治理历程，智库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智库的智力支持在西方国家的全球战略和国内政策中的作用不可小觑，西方国家每一次重大政策决策和行动均伴随着智库的身影。正是在发达的智库系统支持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而其智库也凭借其专业性、创新性和预见性为自己赢得了影响力和声誉，为世界所称道。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胡佛研究所、亚当·斯密研究所等全球顶尖智库正是伴随着其影响力的扩大，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创新、专业和智慧的代表。西方的治理实践和智库功能的显现，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治理，有效的治理，善治都是以治理过程中科学、创新、动态的思想为前提和基础，有效的治理离不开强大的智力支持系统及其思想，智治之维也应成为公共治理的应有之义。智库既是国家的“智商”，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更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也以与之相对应的智库支持系统为前提和基础。西方发达国家业已形成了与国家治理体系相对称的咨询决策体系，这使智库成为公共治理中的中坚力量。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期，治理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前所未有，复杂、多元、动态的各层各类问题都需要智库专业知识和创新思想的支持。党中央高度重视智库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指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习近平强调：“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广泛力量。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和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

迫的任务切实抓好。”^①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是党中央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着眼于健全中国特色决策支撑体系，实现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最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习近平的讲话和党中央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在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标志着新型智库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新型智库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成为国家治理力的重要体现。新型智库将凭借其专业性、创新性在公共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所指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必须切实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充分发挥智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智库的发展充满机遇，也面临诸多挑战和困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我国智库发展很快，在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随着形势发展，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尤其是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② 当前我国智库数量多，但普遍质量不高。智库建设存在结构不合理、缺乏思想市场、独立性和影响力等多元问题，智库的理论研究也存在许多空白。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罗纳德·科斯曾对中国发出十大忠告，其中之一就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③ 科斯所说的思想市场正是智库发展的摇篮。科斯忠告也反映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2007—2013 年全球智库排名中。在影响力方面美国、英国、德国

① 《习近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需要深化改革》，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27/c_1112998021.htm，2014 年 12 月 18 日。

② 同上。

③ 王辉耀、苗绿：《大国智库》，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 页。

位列前三，中国智库初步显示了影响力，但差距很大。“若按人口比例和国家经济实力，中国智库在全球 100 家顶级智库中应至少占据 20 席，至少应有 2 个智库跻身前 10 名。而目前，在全球前 100 家顶级智库中，中国智库仅占 6 家。”^①此外，中国智库还存在结构不合理，“官办智库大而不强，高校智库曲高和寡，民间智库弱而无力”^②等问题。在智库理论研究方面，由于中国智库发展起步较晚，智库理论体系尚未成型，对智库研究的著作并不丰富，且多是对西方智库的介绍和分析，缺乏中国智库建设的优秀著作，对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这与公共治理实践过程中对智治和智库的需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加之当前我国关于智库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大多属于实证研究和分析，且呈碎片化和松散化的研究状态，缺乏对智库及其在公共治理中功能机理的学理分析。这将导致智库理论的发展及其在公共治理中功能的实现缺乏理论基础、逻辑论证和研究范式，其结果将严重阻碍该领域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本书试图弥补这一缺陷，并引起人们对该问题的关注。

二 选题意义

（一）理论意义

全面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充分发挥智库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必须从理论上深化对智库功能的认识。只有从学理上深刻理解“智”与“治”的内在契合和互动关系，进而准确把握智库与公共治理的协同发展机理，才能有效推进智库的建设和功能实现。

目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发展任务日趋繁重，对智力支持的需要日益多元和迫切，对智库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学界热点。智库的相关著作和文献在近几年迅速增加，相关的研讨会和咨询会等也频繁召开，我国的智库研究正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然而，

① 王辉耀、苗绿：《大国智库》，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 页。

② 同上书，第 260 页。

透过智库热的表象,审视智库已有理论研究成果,便会发现我国的智库理论研究还较为薄弱。这种薄弱不仅表现为较之西方智库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的稀缺,更重要的表现是研究内容的表象化和形式化。当前我国已有智库研究多集中于对西方智库的介绍和比较,对智库缺乏中国化研究,对中国智库的发展路径以及中国智库功能的运行机理和实现机制缺乏系统和深入的思考。此外,现有研究对智库及其功能的研究还停留在基于经验观察的简单归纳。对于智库功能何以产生、智库应发挥哪些功能、智库功能如何运行等问题未给予动态追踪和系统的回答。理论上的欠缺必然导致实践上的迷失,当前我国智库热潮下,智库建设数量与质量的反差以及智库研究高水平成果和研究数量的差距,正是智库理论欠缺所导致实践迷失的集中反映。基于当前我国智库研究的现状,我国智库研究者曾发出“智库热的冷思考”^①以及“尽快转变研究焦点和维度,对智库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分析,并加强对‘智库内容’研究”^②的呼吁。其集中反映出对智库及其功能的形式化、单一化和静态化研究现状与智库建设和功能发展对深入化、系统化、动态化研究要求的内在矛盾。因此,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和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进程中,从学理上对“智”与“治”的内在特点和相互关系进行深入分析,进而系统探讨和分析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及其运行机理,对于深化和拓展智库理论和公共治理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 实践意义

管理学家比尔曾说:“旧世界的特点是管理事务,而新世界的特点是需要处理复杂性。”^③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背景下,社会正以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形式呈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使传统治理模式和方法面临“功能性障碍”的同时,也提出了对创新化、动态化

① 薛澜:《智库热的冷思考:破解中国特色智库发展之道》,《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5期。

② 王莉丽:《智力资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

③ [美] W. E. 哈拉尔:《新资本主义》,冯韵文、黄玉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和科学化治理模式和技术的时代要求。我国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要面临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社会所带来的时代课题，还要面对社会主义建设在新时期、新阶段和新形势下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面对时代课题和中国课题，以知识和创新思想为内核的多元化智力支持成为社会各领域建设发展的共同指向，其不仅表现为社会对知识和创新思想日益多元化、动态化、特色化的迫切需求，更表现为由智力支持活动所推动的以“智”为中轴的公共治理模式的逐渐显现。在知识和创新思想成为社会的主要发展动能，智力支持成为时代要求和我国要求的同时，作为知识和创新思想重要载体和来源的智库，也因其多元化智力支持功能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明确提出了要加快智库发展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对智库建设做出重要批示，《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的出台更明确了我国智库建设和发展的方向，我国智库迎来了建设和发展的春天。然而，智库的建设发展不仅需要正确方向的指引，也需要勇于前行和探索的勇气。当我们试图充分发挥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劲智力支持时，许多认知上的缺陷便逐渐显露并发展为智库功能实现的巨大障碍。而如果不能明确智库在公共治理中应发挥怎样的功能，不能准确把握这些功能的运行机理，不能系统化、动态化地追踪功能发展与功能互动，那么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便无法得到正确、全面和深刻理解，其结果必然是智库功能的偏离和障碍。因此，基于时代特征与公共治理特点，以“智治”为视角，深入探索公共治理与智库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作用机理以及协同发展的内在关系，不仅能够使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得以准确锁定，更将使智库功能的运行和发展得到动态化追踪。通过将智库功能以立体化和动态化的方式呈现，将有助于克服当前公共治理实践中对智库功能单一化和静态化的错误理解，进而实现对智库在公共治理中功能的系统化、动态化认知。这对于正确理解智库在公共治理实践中各层次、各阶段和各环节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充分发挥智库在

公共治理中的系统化、动态化功能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和指导意义。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文献述评

一 国外智库研究动态

对智库的系统研究始于美国盛于美国。智库的诞生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出现和飞速发展让西方国家震惊，对苏联的遏制成为焦点。另外，这一时期的经济大萧条也导致对致力于服务公共利益和协助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专业研究机构的需要。1971年美国政治学家保罗·迪克逊所著《思想库》一书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本系统介绍美国思想库形成和发展的著作。他首创性地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概念。迪克逊认为，思想库最早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当时的费城富兰克林研究所（Franklin Institute of Philadelphia）与财政部长签订的为解决汽船蒸汽锅炉问题的委托研究合同，已经基本具备了思想库的显著特征。因此，美国的思想库起源于1832年的费城富兰克林研究所。然而他的这种说法受到了质疑，批评者认为他的观点有些牵强附会，原因在于：如果按照智库就是政府为解决问题而求助的对象的定义，一些具有发挥同样功能的机构如哈佛大学（1636）、耶鲁大学（1701）等机构远早于1832年成立的富兰克林研究所。批评者认为学者与政府官员一起讨论公共政策的历史已超过200年，这种彼此间的交流不能被视为现代意义上的智库起源。在迪克逊著作出版后的20多年间，除了1976年Guuman Daniei出版一本介绍美国思想库兰德公司的非独立性的著作较有影响外，西方学术界关于思想库的重要研究著作一直不多。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思想库在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思想库与政策过程的研究才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西方发展出一套成熟的思想库理论体系，按照研究时间的演进和研究的深入逐步形成了思想库的三个研究路径。

（1）关于智库发展的历史路径研究。主要对思想库的历史发展过

程和兴起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进行系统分析，并对某一思想库的发展历程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对思想库发展全过程的梳理和案例研究，学者们总结出思想库在特定历史时期兴起、发展、成功直至衰落的背景和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学者们通过思想库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的重要作用对思想库的功能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1991年出版了《思想掮客：思想库和崛起的新政策精英》一书，系统分析了政策专家及后来形成的思想库专家发展壮大的历程，并认为作为政策精英的思想库专家是“思想掮客”，他们在“思想市场”中起着信息传播和政策倡导的功能，在思想市场中通过争论争夺本方观点的市场份额。詹姆斯·史密斯将美国思想库蓬勃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发达的基金会、政治体制的开放性、政党权力的虚弱和分散。

另一部重要著作是大卫·瑞奇（David Ricci）于1993年出版的《美国政治变革：新华盛顿和思想库的兴起》。作为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瑞奇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新华盛顿政治文化中思想库的兴起和得以发展的政治背景。他发现在近20年里，美国政府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内部出现“政党准则削弱、国会论资排辈规则的终结、独立身份的国会议员的出现等；政府外部力量逐渐增强，专家地位的萌芽，电视的发展和传播技巧的完善根本性地改变了美国的政策话语。”^① 瑞奇认为，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大量与政策相关的信息涌入和对政策决策的影响使过去政府以足够信息和智慧为支持，在民主社会中理性实践领导责任的模式过时。在“思想市场”中思想库通过争论而日益丰富各种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日益增强。瑞奇还认为思想库影响力的评估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英国学者主要从社会思潮及其发展的路径对思想库的发展阶段和作用进行了系统分析。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考科特（Cockett）1994年发表的《思考那些不能思考的：思想库与经济反革命》以及邓海姆和加奈特1998年所著《英国思想库和思潮》。考科特基于历史路径系

^① 朱旭峰：《中国思想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统分析了英国经典自由派思想库出现、发展、成功、衰弱的全过程。他认为撒切尔主义的胜利源于英国思想库对集体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思想革命。邓海姆和加奈特则通过分析英国思想库发展的三个阶段发现思想库在社会思潮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且关键的作用。他们认为新右派意识形态之所以成为英国主流意识形态，正源于撒切尔在新右派思想库帮助下对保守主义思想的推行。

(2) 关于智库功能的实证研究。随着对智库研究的深入以及这一时期智库的爆炸式发展和影响力的扩大。实证研究开始进入智库研究领域，并逐渐发展成为智库的一种重要方法。智库研究出现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两大实证主义方法。

1996年戴安·斯通(Diane Stone)出版了《俘获政治意象：思想库与政策过程》一书，斯通在中观层次通过案例法分析了思想库在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并提出信息交流在政策机构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此书中，斯通对思想库的组织管理和信息传播网络进行了系统分析，对思想库影响力实现进行了理论阐述，为思想库实证主义的研究路径奠定了理论基础。

詹姆斯·迈甘(James McGann)于1995年出版了《公共政策研究产业中经费、学者和影响力的竞争》一书。书中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了7个美国思想库的基本数据，并进行罗列比较，首开运用定量方法研究思想库的先河。2005年迈甘出版的《美国思想库和政策建议》介绍了美国思想库的概况，分析了思想库信息传播的渠道和体现思想库影响力的指标。

加拿大学者唐纳德·阿贝尔森(Donald Abelson)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思想库及其影响力进行了系统研究。在1996年出版的《思想库与它们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一书中，阿贝尔森通过对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案例研究，系统分析了思想库参与政策决策的过程和机理，特别介绍了思想库在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和实现途径。他特别强调，媒体已成为思想库宣传思想发挥影响力的重要渠道。2002年阿贝尔森出版了《思想库重要吗？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影响力评价》一书，讨论了评价思想库影响力的方法，并认为思想库的